

中日两国人名、称谓文化考

杜 勤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 上海 200093)

摘要: 姓名是个人与社会联系的纽带, 是个人在社会上存在的一种证明。称谓是以本人为轴心确定亲属以及非亲属与本人关系的标志。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 姓名和称谓对于人们来说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 由于两国的历史文化以及价值取向不同, 导致了两国人民在对姓名及称谓的认知不尽相同。中国古代在名字的使用上有避讳的制度。在言谈和书写时, 遇到君父长上的名字一律要回避。取名时也不能取他们的名字中有的或同音的字。这一习俗在亲属称谓以及社会称谓习俗上也留有烙印。从文化对比的角度, 以人名的避讳为切入口, 分析中日两国的姓名及称谓的特征和差异以及所产生的原因。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中日两国的姓名及称谓有一个更加系统的认识, 对中日两国的社会、传统文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关键词: 人名避讳; 长幼秩序; 自我定位; 辈分; 称谓

中图分类号: G 0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16)03-0242-06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16.03.009

A Cultural Perspective on Chinese and Japanese Names and Address Terms

Du Q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The name is the bond between an individual and the society, and it also is a proof of personal existence. Address terms mark and ident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eaker and his or her relatives or other speakers. Therefore, they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both in China and Japan. Since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culture are quite different, the cognition of names and address terms are not the same by Chinese and Japanese people. Naming taboo is common in ancient China; names of the emperor, ancestors and respected people should be avoided speech or writing, characters or even homophonies of their names should not be used when naming a child. This social convention is imprinted on kinship, social addresses and appel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mparison,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features, differences and causes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names and address terms. The research is conducive to a systemic understanding of names and address terms both in China and Japan, which facilitates a deep comprehension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social, traditional cultures.

Keywords: naming taboo; pecking order; self-positioning; family hierarchy; address term

收稿日期: 2015-01-24

作者简介: 杜 勤 (1962-), 男, 教授。研究方向: 日本语言文化。E-mail: 163qindu@163.com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语言现象往往积淀着重要的文化命题，语言常被比作文化的索引，语言符号的解析可以为人们领略栩栩如生、林林总总的文化现象开启方便之门。

人类的姓名产生于社会交际的需要，命名首先是为了方便指称，给人一个特定的社会代码，从某一个姓名联想到某个人，甚至在人和其姓名上划上等号。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看，姓名符号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符号本身，姓名符号在文化深层上反映的是人类对于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调适。在众多文化中，姓名是社会礼仪的一部分，制约着人们的行为规范，浓缩了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

本文将从人名避讳的原初意义入手，探讨中日两国在人名避讳的认知、姓名结构中“自我”定位以及长幼秩序的差异。通过剖析，拨开围绕人名及称谓意识上的两国文化的种种雾障。

一、姓名的避讳

古人把人名看作是人个体的一部分的习俗，几乎是世界性的。所以人刚死，在招魂的时候呼叫死者的名字，以后便讳名，有的还要加上谥名。在吊丧、埋葬添土时都忌呼死者的名字，“因为提及死者的名字，很显然是一种与他接触的延伸……他将很快地跟随着出现”^[1]。忌讳提及死者的名字，是因为“害怕成为已变成恶魔的死者灵魂的牺牲品”。为了避讳叫死者的名字，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为死者另取新名的习俗，而在中国则表现为“谥号”。当然，“这种做法是预设鬼魂不知道且无法知道他新名字的假定”^{[1]43}。

中国古代就有“子不言父名，徒不言师讳”之说。避讳就是回避死者（或生者）的名字，避讳起初只局限于对死者，后来逐渐亦适用于生者。《礼记》士冠礼说：“冠而自子，敬其名也。”说的是男子到了20岁，男子就要有字。有了字，名就成了应该避忌的东西，相称时也只能称字而不是名。

在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中，皇权和父权、王朝政治与宗法制度伴生并存，这种现象表现在姓名上，就是帝王讳名制与宗法讳名制的伴生并存。这种讳名制同样作用于社会语义系统，甚至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行为规范。避讳是一般臣民不可不懂的一门学问，否则，一旦犯讳，可能身罹大祸。就避讳的种类而言，大致有“国讳”和“家讳”之分。回避君主的名字，叫做避公讳或国讳。避讳自己家族

的长辈的名字，与别人交往时，则避对方的长辈之名讳，叫做避家讳。

对皇帝名的忌讳体现是利用国家权力强令臣民对已死的君主七世以内不得直呼其名。《唐律疏议》明确规定，故意直呼皇帝之名，就是犯了“十恶”罪之一的“大不敬”之罪。其方法有改字法，即以同训代之。如正月改端月（秦始皇嬴政讳），邦改国（刘邦讳），恒山改常山（汉文帝刘恒讳），王昭君改王明君（晋帝司马昭讳），世改代或系、民风改人风（李世民讳）。

另外一种形态叫“家讳”，即家庭中对尊长不得直呼其名。东晋桓玄初任洗马时，有客前来祝贺。因客人嫌酒冷不能饮，乃频呼取温酒来，而桓父名温，玄因客犯其家讳，便当席而哭，客扫兴而去。苏洵父名序，洵文中改序为引，轼文中改序为叙。

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号称诗圣，一生中写过3000多首诗。但是在他的大量田园风景诗当中，从未涉及到海棠花，而他曾在以海棠花盛名的四川寓居5年，此事更显蹊跷。原来杜甫母名海棠，出于避讳，他从不写海棠诗。同样道理，他因父亲名闲，写诗从来不用“闲”字。北宋诗人徐积，因其父名“石”，便一生不用石器，走路遇到石头也要绕开，如遇到避不开的石桥，就让人背着过桥。同样，生活在北宋的刘翁叟和韦翼，因其父分别名“岳”和“乐”，他们一生不听音乐，不游高山名岳，不饮酒作乐，不参加任何欢事活动。

对人名的忌讳意识也反映在日本人的意识中，如《万叶集》第一卷的第一首和歌，即雄略天皇御制和歌。

泊瀬朝仓宫御宇天皇代：

大泊瀬稚武天皇

美哉此提篮，盈盈持左手，
美哉此泥锄，轻轻持右手，
尔是谁家女，摘菜来高阜，
尔名又若何，尔能告我否，
大和好山川，向我齐俯首，
全国众臣民，听命随我走，
尔家与尔名，尔能告我否^[2]。

对古代日本人来说，名字和实体是密不可分的，自己的名字被人知道，就意味着向对方公开了一切，于是就得服从于他。这首和歌中“尔家与尔名，尔能告我否”一句，也可以当作男方对女方的爱慕之情的吐露，甚至可以直接理解成求爱的方式。与此同时，女方不加避讳地告诉男方自己的家庭和姓名，

无疑是接受男方爱恋之情的表现。

二、他称词与对称词的汉日语差异

亲属称谓指的是以本人为中心确定亲族成员和本人关系的名称,是基于血亲姻亲基础上的亲属之间相互称呼的名称、叫法,是以本人作为轴心的确定亲属与本人关系的标志。我国是亲属称谓最发达的国家,这些称谓反映出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如日语的“おじさん”一词,汉语中就有“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父”之分。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分析,家庭内部成员彼此以亲属关系词相称是一个跨文化现象,归根结底起源于古代对亲属(尤其是长辈)姓名的避讳。

对古代人名的禁忌意识在中、日两国语言中使用的亲属称谓代用法上刻下了种种印记。但是具体到某个印记,又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或明或暗,或深或浅,两者间同中有异,扑朔迷离,形成两国间跨文化的交流的雾障。亲属关系词在实际运用上有自称词、对称词和他称词之分^[3]。下面分析汉、日语中他称词和对称词的区别。

比方说,汉语中妈妈对买苹果回来的大女儿说:“真便宜啊,等爸爸和妹妹回来后一起吃吧。”这句话改用日语表达时,初学者容易受母语影响说成:“本当に安かったね。お父さんと妹が帰った時にみんなで食べよう。”

汉语表达中,妈妈借大女儿的立场称呼话题中出现的人物“爸爸”和“妹妹”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在日语表达中,作为亲属关系的他称词“妹”这一称呼实属不当,这时候日本人习惯上多以妹妹的名字(美穗、洋子之类)相称。

这个例子说明汉、日语亲属关系中他称词的差异。日语中亲属称谓的他称词只适用于对象为说话者长辈或同辈中年长者的场合,而说话对象为晚辈或同辈中年少者时则“有资格”直呼其名,而不以“弟”“妹”等下位亲属称谓他称词相称。另一方面,在汉语中,不问对象辈分的高低或同辈中的长幼顺序,均可以亲属关系他称词相称,当然对晚辈或同辈中年少者也可直呼其名。即是说,在现代汉语和日语中,忌讳直呼上位者名字的意识没有多大差别,然而在汉语中还残留着对下位者也避讳直呼其名的习惯。在中国古代,不论是上位者还是下位者都得到同样的尊重,名字的避讳并没有上下之别。

国君不名卿老世妇。大夫不名世臣侄娣。士不

名家相长妾。

《礼记曲礼下 第二》

这段话说的是国君、大夫、士对下位者不以真名相称,是为了表示对他们的尊重。

社交称谓是指除去亲属称谓以外的,反映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相互关系的称谓习俗。下面再来看看中日两国对非亲属关系的年幼者的对称词的差异。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对男孩多以“小弟”相称,对女孩多以“小妹”相称,而日本人则习惯上分别以“お兄ちゃん(ぼく)”“お姉ちゃん(お嬢さん)”相称。

因此,若要问小男孩几岁,用汉语说:“小弟弟今年几岁?”同样一句话,用日语则说:“お兄ちゃん、今年いくつなの?”

如果在某处遇到一位迷路的小姑娘,用汉语说:“小妹妹,你怎么了?跟谁一起来的?”用日语则说:“お姉ちゃん、どうした?誰と一緒に来たの?”

日语中,由于不知道其姓名,不能以名字相称,又因为对方是下位者而不能以“妹”相称,只好站在迷路的小姑娘的弟妹的角度,称其为“お姉ちゃん”了。而汉语中使用“小妹妹”这个称呼则遵守了长幼秩序,通过这种关系的确认,给她一种受庇护的安全感。从表面上来看,这不过是从高低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称呼下位者的结果,实际上反映出两国对亲属关系长幼秩序的认知的差异。

汉、日语中的他称(第二人称代词)的使用也有明显区别。汉语中除了用亲属称谓称呼长辈,同时也可以“你”“您”,这反映出在第二人称代词上的禁忌意识已趋于淡薄。

在日语中,下级对上级、孩子对父母等长辈、学生对老师、营业员对顾客,都是不能称“あなた”的,而上述几种情况在中国是可以用“您”来称呼的。

据刘德有先生的《现代日语趣谈》介绍,日本一个话剧团来华演出一出叫“女の一生”的剧目。其中有这样一幕:“节分”这一天,按照日本的习俗各家各户撒豆驱邪,一位丈夫戴着“鬼”的假面具被驱赶着,突然间突发脑溢血一头栽倒在地,不省人事。惊慌失措的妻子把丈夫搂在怀中大声呼喊:“あなた!”“あなた!”,这时同传竟然把它译成“你!你!”而落下了笑柄^[4]。

这个误译其实是译员不谙“あなた”这个词的特殊含义,“あなた”在这里与“你”是不等值的,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第二人称,而是妻子对丈夫的

昵称。因此应根据汉语的习惯译成“孩子他爹（老头子、亲爱的），你怎么了？！”

“あなた”汉字可写作“贵方”、“贵下”、“贵君”、“贵女”。据刘德有先生考证，“あなた”即“彼方”，本来是相对“此方”而言的，为第三者的敬称。歌舞伎的脚本《倾情吾孀鑑》中有一段台词说：“傘を以て貴方のお屋敷までお送り申し上げて参れ。”这里的“贵方”明显是指“あのお方”。到了近世，“あなた”转化成对对方的尊称，一般用于身份比自己高的人或同辈^{[4]135}。到了现代又转化为称呼同辈以下的人的雅称或恋人、夫妻之间女方对男方的昵称。昭和53年（1978年）4月出版的金田一春彦、池田弥三郎共著的《学研国语大辞典》中“あなた”的定义为“相手を指す語（对等または下位の者に用いる）”，同时注明，“古くは对等または上位の者に用いた”。总之，第二人称的称呼是日语的一大难点，用法极其复杂，特别不能用汉语的“您”套用“あなた”。怪不得有人指出，如果在会话时一次也不使用“あなた”、“きみ”、“先生”等人称代词称呼对方，也能把话讲得井井有条，那么他的日语算是学到家了。

三、长幼秩序意识的差异

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注重辈分关系，如年纪差异很大的哥哥姐姐的孩子（有时甚至比自己大）也必须称自己为“叔叔”“舅舅”。而日本则显得不在乎“辈分”，本当被侄子、侄女叫作“おじさん”“おばさん”的人，即使称他一声“お兄さん”“お姉さん”，他也会欣然应答，不会理会其中辈分的误差，这一点上与中国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中国称呼上辈分的混淆被视作“大逆不道”，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这种意识直至今天还残留在我们的脑子里。

“あなた、おいくつ？ おお、お若い、お若い。私の息子と変わりませんなあ。”（你多大了？哦，真年轻啊。跟我儿子岁数差不多）。

在日本同辈之间可以听到这样的“奉承话”，听者若是日本人，心里自然会美滋滋的，但是要换成中国人，哪怕是受足了日本文化熏陶的中国人，也是高兴不起来的。

长幼之分在中国根深蒂固，甚至是高于一切之上的，这种意识集中体现在称呼上。中国人被人降格用晚一辈的称呼相称，心中就会忿忿不平，甚至会感到侮辱。中国女子如果过了20岁，也许会提醒她的亲

属关系或非亲属关系的姐妹们：“姐姐已经20岁了，要叫我‘阿姨’，甭再叫‘姐姐’了。”十多岁的女子被孩子叫做“阿姨”也会毫不在意，这与到了阿姨的年龄也不愿被称作“おばさん”的日本女性的心理截然不同。再比如说，家中生了孙子、孙女，周围的人会说“当上奶奶了，恭喜了”，“奶奶”这个称呼似乎成了一种表示祝贺的礼貌用语，本人也由于辈分的升格而沾沾自喜。在日本，如果受到这样的“祝贺”，恐怕大多数人不愉快，心里会想“まだおばさんなんかじゃない。まだ若いんだから”（我还算不上什么奶奶，我还年轻着呢！）这是因为她们希望自己被叫得年轻一些，至于辈分什么的就被置之度外了。

很显然，中日两国对女性在称呼上的差异起源于长幼秩序、辈分意识的旧家族礼教观念。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惜青春韶华乃天下女子的共同心理，然而，在中国人的意识中长幼秩序这个更重要的原则占了上风。

由于不同语言系统的社会成员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心理背景，表示同一事物和概念的词，可以反映截然不同的内涵。中日两国对“老”的理解也有差异。中国有尊老敬老的传统，至今还保留着这种遗风。汉语的“老”在大多数场合具有“富于经验、智慧、和蔼可亲”的内涵。“徐老”“董老”“郭老”是对德高望重的重要领导人徐特立、董必武、郭沫若的尊称；“老爷爷”“老奶奶”则含有“慈祥”“和蔼”的意思。

四、名字避忌上的差异

对祖先及家族成员名字的避忌是一种跨文化的现象，中日两国这方面的共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有事例表明日本人对祖先名字的避忌似乎不如中国人那么严格。如镰仓初期有一位武士叫佐佐木秀义，他在追讨源义仲的宇治川之战中与梶原景季争打头阵名声大噪，《平家物语》中对这个故事作这样的描述：

“宇多天皇より九代の后胤、佐々木三郎秀義が四郎高綱宇治川の先陣ぞや……”

只见他脚踏马镫，一跃而起，面对密布在河两岸黑压压的人群高声疾呼自己和父亲的名字，挟武门弟子之荣誉威震四方。这种英勇壮举日本人无不为之动容。但是，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作为儿子，对父亲的名字不但不避讳，反而在大庭广众中大喊大叫，这无疑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威慑敌方，鼓舞

我方的斗志,中国人会大喊大叫自己的名字,而不会叫自己祖先的名字。

例如,《三国演义》第五十二回攻取零陵的一节即是很好的佐证:

两军对阵,道荣出马,手使开山大斧,厉声高叫:“反贼安敢侵我境界!”只见对阵中,一簇黄旗出。旗开处,推出一辆四轮车,车中端坐一人,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执羽扇,用扇招安道荣曰:“吾乃南阳诸葛亮也。曹操引百万之众,被吾聊施小计,杀得片甲不回。汝等岂堪与我对敌?我今来招安汝等,何不早降?”

中国人小时候就懂得避讳父母的名字,父母的名字在孩子的心目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甚至自己的名字有时也是藏而不露的。相比之下,日本人的名字,包括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什么神秘感可言。日本人的住房前,总爱挂上一块牌子(日语叫“表札”),所有家族成员的名字一个不漏地写在上面,真可谓“光明正大”,慷慨大方。上学的孩子的用品,小到一支铅笔,一块橡皮,一块手绢,大到书包,自行车都不厌其烦地一一写上主人的名字。每每写信封时,也恭恭敬敬地写上(或印上)寄信人的全名,甚至电话号码。而中国人写信封时,一般不写全名,或者从略,或者只写姓,后加上“缄”字。

顺便提一下,欧美、阿拉伯地区的人们对祖先的名字也是毫不避讳的,用祖父、父亲的名字给儿子命名是他们由来已久的传统,当面称呼父亲大人竟如同对待亲朋好友似的,“Karl”“Stephen”的吆喝,我们中国人听着也会心惊胆颤。

五、姓名结构中的“自我”定位

姓名是社会分类系统的一个重要部分,姓名一方面属于个人,同时也不可抗拒地刻上了命名者对被命名者社会控制的烙印,以汉民族为代表的中国人实行的排名制,体现了某种特定的社会成员所共同遵守的社会准则。

姓名的确定,既在家族群体中区别了个体,也相对其他群体整合了本家族群体。封建社会的姓名符号结构,体现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当时社会的认知模式中,姓名结构的动摇甚至无序,也就是社会结构的动摇和无序,无异于“礼崩乐坏”,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

汉民族的姓名结构可切割成“姓”和“名”两个部分,姓在先,名在后,直观地象征着名向姓

的绝对的服从和归属。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被儒教影响辐射到的国家至今也还保持着这样的传统。中国人在用汉语拼音表示人名的时候也不会更改姓名的顺序,如“鲁迅”“毛泽东”作“lu xun”“mao ze dong”。然而与中国人相比,日本人显得不太拘泥姓和名的前后顺序,日本人的姓名用罗马字表示的时候,大多遵照西方人姓名排列的做法。如“山田太郎様”则写成“MR. taro yamada”,姓名结构由此颠倒顺序了。

中国人除了维护大家族体系的共用符号“姓”以外,还重视家属关系中横向的排序,即同辈中的排行。根据兄弟姐妹间的排行秩序,在姓氏后面加上表示顺序的称呼和数字,在我国源远流长,可上溯至夏商时代。那时帝王名字中已见用天干的“甲乙丙丁午己庚辛壬癸”的排行,如称夏桀为“帝履癸”,成商纣为“第辛”,以及“太甲、外壬、祖丁、盘庚”等,周代以后还常将“伯仲叔季”等字冠于贵族的名字之前以示排行,如“伯夷、叔齐、仲山甫、季路”等。其实《诗经》中《伯兮》《叔于田》等篇中的“伯”“叔”均为主人公的字,又皆由来源于排行。夏商周三代,未婚女子亦常在姓前加“孟”名“姜”,实际上“孟姜”是春秋时齐国姜姓长女的通称,姜家大小姐是也,后又泛指美女。再如“仲子、叔姬、季隗”等女子,“子、姬、隗”皆为她们的排行。汉高祖刘邦又称刘季,“季”也是他的排行。

自古以来,汉族和受汉族影响的其他一些民族传承着典型的“行辈排名制”,公元前136年开始,汉武帝把儒教视为政治统治的重要法宝,儒教也渐渐地获得了国家宗教的地位。公元3世纪前后儒教的伦理道德广泛地为世人所接受,“行辈排名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了^[5]。当时规定同姓同宗同辈者皆用一个固定的字或者偏旁取名,不同的辈分使用不同的字或其偏旁,世代相传。有的家谱规定了五言诗四句二十字,依世排名,周而复始,象征香火不断,轮生轮回。同宗同姓的人之间,见了名字就知道自己相应的社会地位和行为规范。族谱是施加在姓名上的社会控制,例如,孔子家族使用50个字来排列世代。

希言公彦承	宏闻贞尚衍
兴毓传继广	昭宪庆繁祥
令德维垂佑	钦绍念显扬
建道敦安定	懋修肇益常
裕文焕景瑞	永锡世绪昌

^[5]71-72

毛泽东的名字也是严格按照其族谱取的,《毛氏族谱》始修于乾隆二年(1737年),从第七代起有了固定谱系,加上光绪七年修谱续订的谱系,合起来成一首五言诗。

立显荣朝士,文方运济祥。

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

孝友传家本,忠良振国光。

起元敦圣学,风雅列明章^{[5]72}。

毛泽东的辈分在诗的第三句“祖恩贻泽远”的“泽”字上,第14辈,毛泽东的“东”字也是有根据的。古俗以东南西北对春夏秋冬、伯仲叔季。毛泽东虽然排行老三,但在兄弟中居长,故取“东”字,以表“老大”之意。

上述中国人的姓名结构反映出儒教社会共同的重要文化命题,即人名在“孝”的名义下,首先要服从作为同宗同祖的整个大家族标识的“姓”,然后还要服从于“行辈排名制”中所规定的作为同姓中同宗同辈者的共同标识的固定的字或者其偏旁,对本人来说最重要的名反倒排在末端的位置,这样的结构遑论个体的独立,个性的自由。

欧美人的姓名结构则正好与以汉民族为代表的儒教国家的姓名构造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的姓名

(personal name)一般由洗礼名(christian name)和姓(family name)构成,合称为“full name”,其中,多数英国人则称个人名为“christian name”,家名为“sur name”,美国人则称为“first name”“second name”“last name”。总而言之,从欧美人的姓名结构中可以窥探出基督教的精神特征,基督教崇尚个人的自由,个性的完成,作用于把人们从父权、家族关系、血缘关系的羁绊中乃至国家性统率力中解放出来,从而与儒教文化圈的姓名结构所反映的文化命题形成鲜明的对比。

参考文献:

- [1] 赵建伟. 中国古代禁忌[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1: 42.
- [2] 岩波书店. 日本古典文学大系[M]. 东京: 岩波书店, 1974 - 1975.
- [3] 樱田芳树. 名字与忌讳——在日语与汉语中的表现与渊源[M] // 耿龙明, 何寅. 中国文化与世界. 第一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3: .
- [4] 刘德有. 日本語の面白さ[M]. 东京: サイマル出版会, 1986: 124 - 125.
- [5] 纳日碧力戈. 姓名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编辑: 朱渭波)

(上接第224页)

- [13] 王克非. 新型双语对应语料库的设计与构建[J]. 中国翻译, 2004(6): 73 - 75.
- [14] 赵秋荣, 王克非. 英译汉翻译语言的阶段性特点——基于历时类比语料库的考察[J]. 中国翻译, 2013(3): 15 - 19.
- [15] 秦洪武, 王克非. 对应语料库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 理论依据和实施原则[J]. 中国翻译, 2007(5): 49 - 52.
- [16] 刘泽权, 刘超朋, 朱虹. 《红楼梦》四个英译本的译者风格初探——基于语料库的统计与分析[J]. 中国翻译, 2011(1): 60 - 64.
- [17] House J. A Model for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M]. Tübingen: Gunter Narr Verlag, 1977.
- [18] House J.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Past and Present [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19] McAlester G. The evaluation of translation into a foreign language [C] // Schaffner C, Beverly A. Developing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229 - 241.
- [20] PACTE. Building a translation competence model [C] // Alves F. Triangulating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in Process Oriented Research.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3: 43 - 66.
- [21] PACTE. Investigating translation competence: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J]. Meta, 2005, 50(2): 609 - 619.
- [22] Laviosa S.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y, Findings, Applications [M]. Amsterdam: Rodopi, 2002.

(编辑: 朱渭波)